



溯源：張愛玲的香港大學

一九七七年六月，住在南加州的張愛玲給遠在香港的摯友宋淇、宋鄺文美夫婦寫信，信中有這樣一段：「前兩天在附近那條街上走，地下又有紫色落花了，大樹梢頭偶然飄來一絲淡香，夏意很濃。每年夏天我都想起一九三九剛到香港山上的時候，這天簡直就是那時候在炎陽下山道上走着，中間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片空白，十分輕快。」

這一段日常生活裏的瞬間，與過去時光的記憶重疊，也唯有張愛玲特有的筆觸才能傳達出這清晰而又恍惚的效果。如果拍成電影，此刻應該是一個空鏡頭，一片澄藍的

天，一絲微風的顫動，間或飄下幾片花瓣。鏡頭隨着樹影晃動，更隨着手持鏡頭的人下坡疾走而搖動，四周的寂靜裏都是聲音。這是一九三九年的香港，也是一九七七年的洛杉磯。

一九三九年夏天的張愛玲，剛從中學畢業，因為歐洲的戰事，無法去倫敦上學，轉到香港大學文學院。八月註冊，住進了港大後山寶珊道上的聖母堂宿舍，每日到校園的本部大樓上課或圖書館看書，都要從長長的蜿蜒的山道上下來；而回宿舍，則要爬上一個高高的坡，每一回都有要登頂的感覺。當年的「一片空白」，是因為充滿着期待。兩年後香港之戰的衝擊，很快就將這個空空的鏡頭填滿，之後幾十年的遷徙，生命裏發生的種種，都有文字刻下的深深的烙印，顯然不是「中間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片空白，十分輕快」。

因為港戰而中斷了學業的張愛玲，一九四二年五月回到上海，開始了她漫長的寫作生涯。她早期散文中自傳性最強的兩篇〈私語〉和〈燼餘錄〉最初都發表於一九四四年。〈私語〉是童年經驗的回憶，篇末說：「考進大學，但是因為戰事，不能上英國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後又因為戰事，書沒讀完就回上海

來。「〈燼餘錄〉則是接着上海的童年記憶寫在港大唸書的那三年：「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的距離了——幾千里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兩年時間並不長，卻是「相當的距離」，宛如隔世。假如說〈私語〉是她書寫童年經驗的一個濃密的開端，那〈燼餘錄〉可看作是她梳理香港經驗的一個索引，之後不斷重寫、轉寫、擴寫，每一次的敘述再生，都可以追尋到最初寫下的那些「切身的、劇烈的影響」。

張愛玲寫信的一九七七年，嘔心瀝血寫就的自傳體長篇《小團圓》初稿完成，她聽從宋淇夫婦的建議，暫不發表，但從那幾年的書信中可以看到，她沒有放棄，仍在來回修改中。同時，《紅樓夢》研究已頗有成果，文章連續發表在港台的各種刊物上，一本《紅樓夢魘》即將出版，她甚至有以紅樓夢研究打入美國學界的計劃。另外，十年前就開始的《海上花》的英譯仍在進行中，而短篇〈色，戒〉從二十多年前的英文舊稿中重新撿起，在與宋淇的來回通信中反覆切磋、修改、圓潤。整個一九七〇年代是張愛玲後期寫作中的一個旺盛期。從美東到美西，從北加州到南加州，搬遷很多次，大環境離戰前香港已相去甚遠，

但在她用文字構築的世界中，學生時代的烙印依舊深刻，彷彿仍在眼前，所以她說「每年夏天」都會想到，記憶的節奏與季節的更換合拍，是日常的一部分，是生命的底色；說「中間什麼事也沒發生過」，無非是強調香港的經驗在她生命中刻骨銘心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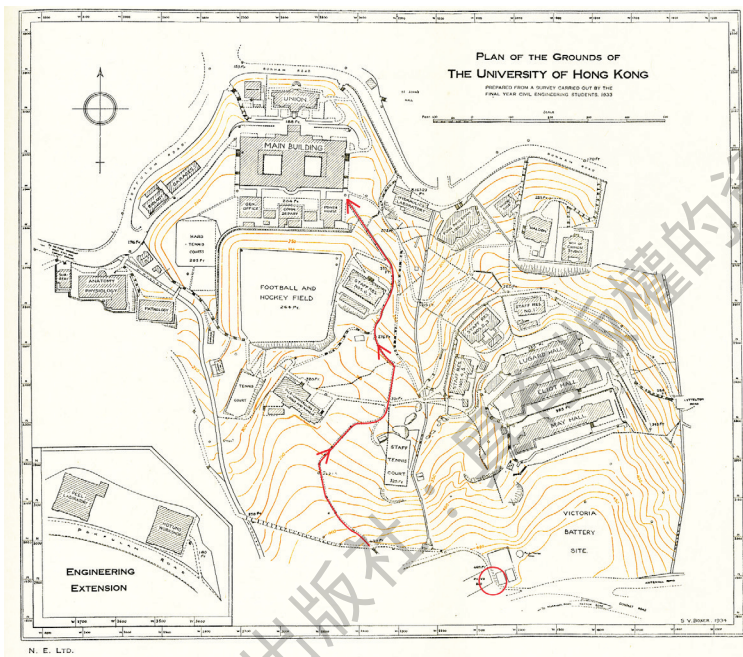
散文〈燼餘錄〉也是我寫作這本書最初的一個索引，它為我提供了很多線索，提示我應該從哪些方向去細細的挖掘。關於戰亂時期的大學校園文化，張愛玲最精準和犀利的表達仍然是〈燼餘錄〉這篇早期經典中的經典。雖然近年出土面世的長篇《小團圓》和《易經》中對香港之戰的前前後後都有更多的鋪陳，重讀一九四四年二月初發表於《天地》雜誌的〈燼餘錄〉，仍不免感嘆那區區七千餘字的篇幅裏，埋藏了多少長篇敘述的可能。這是張氏早期散文中我情有獨鍾的一篇。英文版的翻譯裏有我的字斟句酌，且多次撰文討論，在太平洋彼岸的大學課堂上無數次地給學生解析，熟稔至此，重新閱讀還能有一樣的體會嗎？

張愛玲曾說她未完成的〈愛憎表〉是「在出土的破陶器裏又檢出這麼一大堆

陳穀子爛芝麻來」。我在這本書裏重新梳理張愛玲和她母校香港大學乃至香港的因緣，有新鮮出土的材料，卻不是什麼破陶器、陳穀子、爛芝麻。寫作的意圖無非是調整焦距，以檔案資料為佐證，還原一些模糊的歷史影像，釐清一段戰亂時期的人文經驗。調整焦距是要聚焦於張愛玲和香港之間究竟是什麼關聯，尤其是，她在港大唸書並且遭遇香港之戰的那三年對她之後的寫作生涯究竟意味着什麼。

寶珊道、旭龢道、大學道

我的梳理從描繪一張路線圖開始。一九三九年八月剛到港大的張愛玲住進了港島西半山寶珊道八號新開張的聖母堂女生宿舍。從今天的寶珊道八號即愛敦大廈（Hamilton Court）出發，沿着下山的路，可以追尋她當年從宿舍到學校上課的途徑。港大校園依山而建，寶珊道位於校園後更高的一個坡上，從宿舍到課堂是一路的緩坡和陡坡。寶珊道不長，是個東西向的緩坡，往西走不到



圖一·一香港大學一九三四年校園規劃圖，由土木工程系畢業班的學生在他們的老師帶領下集體設計。地圖下方的大學道包圍着校園的南端，道正中有一條沿着山坡往山下延伸的長長的石徑，蜿蜒到本部大樓的東邊，應該是去上課的最佳捷徑（紅線所示）；從大學道出口（紅圈所示）沿相反方向經耶穌道往山上走，就可通往日後聖母堂的所在。原圖藏香港大學檔案館，記號為作者後加。



一百米就到了寶珊道的西端，這裏山路轉了一個大彎，與旭龢道銜接。當年的山路沒有瀝青鋪面，窄小得多，但路邊的護坡石牆和根鬚盤繞的細葉大榕樹應該在張愛玲的時代就有了。當年的樹木沒有今天的高大、茂密，可以想像張愛玲的夏日記憶中「炎陽下山道」的景象。相對於建築的週期更替，香港島上的這些石牆樹是更恆定的歷史見證。

連着寶珊道的旭龢道也是一個緩坡，往東不到兩百米就到了校園在大學道的出入口。大學道的坡就陡多了，可以沿着它從西側進入校園，也可以取一條更加陡峭的，順着山坡往下

圖一·二 寶珊道八號現在是一棟建於上世紀七〇年代初的愛敦大廈，當年應該是豪華公寓，現在已顯陳舊。作者攝於二〇二二年二月。

